

牛顿力学革命之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意义

郑晓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摘要: 启蒙运动发轫于 17 世纪末的英国, 牛顿力学革命作为英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孕育着 18 世纪的时代精神, 为法国启蒙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基础。为了批判宗教、政治和形而上学, 法国启蒙运动把牛顿的方法移植到人文社会领域, 同时也导致了 对牛顿思想的误读。

关键词: 启蒙运动; 牛顿; 力学革命; 理性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0)01-0110-04

The Significance of Mechanics Revolution of Newton for French Enlightenment

ZHENG Xiaoso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Enlightenment is originated from Britain in 17th century. Mechanics revolution of Newton a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nlightenment in Britain is pregnant with spirit of the times in 18th century and provides French Enlightenment with rich thought resources and methodological basis. In order to criticize religion, politics and metaphysics, the methods of Newton is transplanted to fields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in French Enlightenment meanwhile which leads to misunderstanding for the thought of Newton.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newton; mechanics revolution; reason

一、牛顿力学革命是英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历史思潮, 发轫于 17 世纪末的英国。恩格斯早就指出: “如果说, 法国在上世纪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 那末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事实: 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做出了这个榜样, 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学习这个榜样呢。至于讲到思想, 那么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其他人大力阐明的思想, 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里呢?”^[1] 英国科学史家沃尔夫强调: “启蒙运动实际诞生于 17 世纪, 而且是在英国”。^[2]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也承认: “若无英国人, 理性和哲学在法国可能还处在最可鄙的蒙童状态”。^[3]

17 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主要包括: ① 政治领域的“光荣革命”。1688—1689 年, 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斯二世的专制统治和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 因为没有人员伤亡和流血冲突, 史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通过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议会的权力高于君主, 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基本制度框架, 废除了政治领域的个人权威和专制统治, 为民主的议会政府和权力制衡的政党制度奠定了基础; 《权利法案》还废除了报刊杂志、学术著作的审查制度, 保证了言论和出版的自由。② 宗教领域, 除政治方面的意义外, “光荣革命”还确保了宗教信仰的包容性, 杜绝天主教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而树立的绝对信仰的宗教权威。此外, 席卷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 尤其是加尔文宗诸如“因信称义”、“良心自由”等思想传到英国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营造了较为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③ 哲学领域, 从培根到霍

收稿日期: 2009-11-23

作者简介: 郑晓松 (1973—), 男, 湖北黄冈人, 副研究员, 哲学博士。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哲学。

布斯、洛克的经验论传统,充分论证了人的理智因素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意义。培根强调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经验论和归纳法是获得正确知识的唯一方法;霍布斯把机械论哲学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断言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感觉乃是由外在对象物和人类感官的机械作用产生的;洛克在培根和霍布斯的理论基础上,系统建立了完整的经验论哲学体系。^④文学领域所体现的资产阶级冒险精神(代表是《格勒佛游记》和《鲁宾逊漂流记》)和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思潮(标志人物是亚当·斯密)尽管发生在18世纪,但从理论逻辑上讲,是17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延伸,而非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所致。^⑤自然科学领域的牛顿力学革命。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把天体和地上物体的运动规律统一到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表述的经典物理学框架中。系统论述三大定律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17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其革命性的科学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反响推动和影响了整个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二、牛顿力学革命与18世纪的时代精神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评价牛顿力学革命时指出:“牛顿工作的两个最大成果是,(1)证明地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于星球;(2)从自然科学的大厦中排除不必要的哲学成见”。^[4]牛顿力学革命表明,天体不是希腊特别是在中世纪宣称的那样具有神圣的性质,从力学的角度讲,其规律和地球上的自然现象并无二致。另外,自然科学再也不需要未经证实的形而上学假设和先验的逻辑演绎,经验观察、实验分析和数学综合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探究的方法。具体来讲,17世纪末以牛顿力学革命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推动当时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一是从超验到现世的转变。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指向和路径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上帝,它只是强调现世的重要性,热衷于尘世的生活并不有悖于超验的世界,通过对当下世界中神的创造物的考察,同样可以领悟神的智慧。“随着17世纪科学成就的增长,源自设计的论据开始取代先验的理性论据,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圣经》的《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如果能够从上帝的创造物知晓上帝,那么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无须《圣经》了”。^[5]二是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变。牛顿的成就证明,通过观察、实验和理论综合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识,甚至能推翻一些建基于绝对信仰上的宗教观念,神圣的天体可以被正确地统一到力学的规律之下,《圣经》不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源泉,知识的领悟并不以信仰为前提,相反,理性的分析和推理才是通达知识的正确道路。“显然,在牛顿的时代(科学知识的第一次大综合时代)人类学术观点方面的革命,也带来了教条的宗教信仰的陈述方面的一场革命。……光不再是弥漫四周、纯粹、无色的神秘物质,不再是上帝的住所,而成了一个物理现象,它的规律可用反光镜和透镜来研究,它的颜色可用三棱镜来分析。……宗教信仰的寄身之所由心转移到头脑中,神秘主义被数学所驱逐”。^[4]三是从神秘主义到自

然主义的转变。牛顿用刚性的、机械的“力”取代天体运行中的神秘因素,以数学公式表述其规律,得到经验的有力证实,取得巨大成功,这表明,无论是地上的万物,还是宇宙的天体,都固有其自然秩序和规律,根本不存在神秘因素的干预和超自然的意志。

“现世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为18世纪的时代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以伏尔泰为领袖的启蒙思想家强调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高举“理性”的批判大旗,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大力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观念,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摧毁天主教的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因而18世纪通常和“启蒙”、“理性”、“哲学”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要更准确地概括18世纪的时代精神的话,“人文主义”可能更加准确。“十八世纪被冠之以各种名称:‘理性时代’、‘启蒙时代’、‘批判时代’、‘哲学世纪’。这些它都称得起,而且还不至如此。它最贴切的名称或许是‘人文主义时代’”。^[2]人文主义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是三重历史转变——从超验到现世、信仰到理性、神秘主义到自然主义的必然结果:现实主义实现了宗教观和宇宙观的转向,使对人自身的关注成为可能;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变,既为一种开明的基督教以及康德所追寻的“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宗教”开辟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智创造性和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是体现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自然主义将神秘因素从自然秩序和规律中剔除出去,更是18世纪法国机械论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对此,沃尔夫指出:“我们这里应该尝试说明某些表征十八世纪之特质的重要特征;我们打算简要地考察一下它的现世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一切促成了一种宽容人文主义的诞生”。^[2]可以说,牛顿以一种相对温和、保守的立场,通过物理学革命开启了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序幕,而法国启蒙运动则以浪漫、激进的立场,以批判宗教权威、政治专制和哲学形而上学为目的,通过社会科学(主要是哲学等人文科学)进一步张扬了人文主义思潮。

三、法国启蒙运动的“牛顿主义”倾向

正如牛顿力学革命是17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18世纪法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同样应该理解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达朗贝尔本人就是百科全书派的重要成员)。达朗贝尔、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等对牛顿力学进行系统化,进一步完善经典力学的基本框架。达朗贝尔确立了经典力学的分析力学分支,提出达朗贝尔原理,奠定了液体力学的基础(牛顿最早系统研究流体力学)他的著作《动力学》是力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拉格朗日也是分析力学的创立者,在其名著《分析力学》中,他发展了达朗贝尔和欧拉等人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拉格朗日方程,把力学

体系的运动方程从以力为基本概念的牛顿形式,改变为以能量为基本概念的分析力学形式,为把力学理论推广应用到物理学其他领域开辟了道路。拉普拉斯被誉为法国的牛顿,他提出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定理,他用微分学系统诠释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内容,并补充了很多重要的细节,其名著《天体力学》是经典天体力学的代表作。可以说,18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在牛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此不难理解,拉格朗日把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誉为人类心灵的最高产物,称赞牛顿是历史上最伟大而幸运的天才。

牛顿学说通过18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得到深化,但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却走向“牛顿主义”,“于是,启蒙运动的科学就是‘牛顿的’,其哲学就是‘牛顿主义’的哲学”。^[5]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①牛顿学说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旗手,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哲学和政治学专著——《哲学通信》中,用相当大篇幅介绍牛顿学说,并且说:“对于法国人而言,《哲学通信》是他们了解牛顿的入门书。”^[5]1738年,伏尔泰还出版了《牛顿哲学基础》一书,对牛顿物理学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介绍。此后,他在认真研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基础上,协助夏特莱侯爵夫人把该书翻译成法文,这也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最早的法语版本。伏尔泰是牛顿学说的忠诚信奉者,他说:“我们都是牛顿的学生;我感谢他独自发现和证明宇宙的真实体系。”^[6]另外,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霍尔巴赫,机械唯物主义的拉美特利等也都深受牛顿的影响。②由于牛顿学说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把牛顿学说中的部分思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作为批判当时法国社会唯一有效的罗马教的权威、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哲学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

所谓“牛顿主义”,就是把牛顿建基于近代物理学革命基础上的“科学理性”推及为一般的人类理性,从而把牛顿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人文社会领域。通常认为,牛顿的“科学理性”主要表现在:①怀疑精神。牛顿从来不相信依靠信仰或权威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极力否定古希腊特别是中世纪自然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无法经验证明的先验假设,他从来不敢发表不能用观测或实验证实的观点和理论。②机械论自然观。牛顿接受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相信机械的力的存在,认为物质由惰性的粒子组成,粒子之间存在着引力和斥力,宇宙万物按照物理必然性运动。③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牛顿继承了英国经验论传统,坚持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获得科学知识。“在整个17世纪,分析和合成通常被看作是两种不相干的方法:分析,或叫作‘分解’,是发现的方法,而合成,或组合,是证明的方法。但是在牛顿手中,它们合二为一,不仅仅用于思维的过程,而且用于实际的实验。对于牛顿来说,分析包括‘实验,观察以及通过归纳从实验和观察中所得出的普遍的结论’。分析和合成意味着通过分解和组合去理解自然是怎样运转的。”^[5]

④自然规律的数学化描述。同伽利略一样,牛顿坚信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认为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简单、均匀的数学秩序。他强调,通过经验观察和实验推理而总结出来关于自然规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可以用相应的数学原理予以恰当描述。为了解决力学中的运动问题,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这种和物理概念直接联系的数学理论。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系统论述三大力学定律的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可否认,牛顿的“科学理性”强调怀疑精神,强调依靠人的理智而不是宗教信仰达到探寻科学真理的目的,同样适应于人文社会领域。但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在借鉴牛顿思想的同时却走向“牛顿主义”。其一,把机械论思想推向极致。伏尔泰认为,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人必须服从这部机器的自然定律,尽管上帝是这个机器的起因,但之后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后期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则更进一步,主张理性与自然是完全自足的,因而不需要作为起因的精神上帝。孟德斯鸠坚持自然规律扩展到人类行为的信念,认为气候变化决定人的气质和性格。以魁奈为首的重农主义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必然规律和可以测定的。拉美特利更为极端,直接宣称人是机器,他说:“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7]在他看来,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各种生理和思维现象都是机械运动,他还根据当时医学提供的材料和证据把人类的心灵和精神活动完全归于机体的组织状况,不同体质的人,具有不同的精神和性格。其二,把数学视为理性的典范。百科全书派的重要成员达朗贝尔自始至终都坚持数学理性主义态度;孔多塞和重农学派的杜尔哥认为自然科学为人性的运作提供了远见卓识,强调在入学研究类比物理科学的方法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首先使用“社会科学”这一术语,突出其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和定量分析的特征;尽管卢梭抨击科学,但他却推崇自然科学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在《社会契约论》中,他甚至试图对国家作完全几何学的分析。其三,把牛顿物理学的经验分析的方法理解为人类一般的思维工具。“18世纪没有跟着以往的哲学学说中的那种思维方式亦步亦趋;相反,它按照当时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为解决哲学的方法这一关键问题,人们求助于牛顿的‘哲学思维的准则’,而不是求教于笛卡尔的《方法论》结果,当时的哲学走上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因为牛顿的方法不是纯演绎方法而是分析的方法。”^[8]不仅如此,“18世纪哲学不满足于把分析仅仅当作获得数理知识的伟大的思想工具,它还把分析看作所有一般思维之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这种观点在18世纪中叶获得了胜利。无论个别思想家和学派所得出的结论如何不同,但他们都赞同这个认识论的前提”。^[8]总之,由于坚定捍卫“牛顿主义”,“18世纪中叶法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唯物主义者自己觉得他们比牛顿本人更像牛顿”。^[9]

四、法国启蒙思想对牛顿的“误读”

牛顿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宗教的目的甚至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因。“牛顿的家庭宗教气氛浓厚,他的继父和舅父都是牧师,抚养他长大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送牛顿上剑桥大学的目的,是希望他将来作牧师。

1678年,牛顿在剑桥毕业时,按照一般惯例,理应接受神职。但是,牛顿却公开声明,为了更好地‘侍奉上帝’,他将不接受神职,而代之以自然哲学的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赢得了英王查理二世的特许。……他说:‘从事物的表象来论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份内的事。只有在科学工作中揭示和发现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10]牛顿始终认为,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及其运动的合乎规律性,是上帝自由意志的充分体现,“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形式是如此绚丽多彩,各种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不是别的,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上帝的自由意志”。^[10]不仅如此,牛顿还在其物理学体系中为上帝留有充分的地盘,他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绝对时间和空间理解为由神的永久与无限的存在构成的,他甚至请出上帝直接干涉太阳系中因为彗星作用而呈现出的不合力学规律的现象,牛顿后期更是把主要精力投身于关于第一推动的神学研究。此外,牛顿一直都痴迷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炼金术,他晚年患上精神分裂症和他迷恋炼金术,每天和水银打交道而中毒不无关系。在牛顿遗留的手稿中,神学方面的内容有150万字之多,而关于炼金术也有50多万字。但是,如此具有宗教气质和笃信神秘主义的牛顿,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却被奉为机械论哲学的成功典范,其学说竟然是批判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重要武器。伏尔泰、前期狄德罗、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坚持自然神论的思想,尽管他们从机械论哲学出发,用惰性的机械力替代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活力,将上帝请出了自然观和认识论,但还是承认作为第一推动的精神上帝的存在;霍尔巴赫则完全摒弃了上帝,其名著《自然的系统》成为当时“无神论者”的《圣经》,拉美特利把人类的意志、精神等归结为物质的机械作用,攻击基督教和一切有神论。丹皮尔说:“另一方面,牛顿的法国门徒,却认为牛顿的体系说明实在是一副大机器,它的所有的基本要素都已经了解,所以人身体与灵魂就由于不可战胜的和机械的必然性而成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例如伏尔泰在他的《愚昧的哲学家》书中就说:‘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定律,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却可以不把那些定律放在眼中,完全任性地为所欲为,那就太奇怪了。’伏尔泰忽视了自然定律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人的心灵的本性和自由意志的本质等问题。但他生动地表达了法国当时对于牛顿宇宙论的哲学和宗教含义的流行看法。”^[14]

尽管牛顿的宗教情结影响着他的物理学,但他在自己的力学体系中很好地调和了上帝与科学的关系,并且严格将道

德因素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他通过仪器和实验把人的主观意愿与科学方法割裂开来,用毫无人情味的数学原理描述宇宙和自然通过机械的力表现出来的必然规律,“但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希望从自然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规律和理性包含了道德律令”。^[5]因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把牛顿的方法移植到入学和社会学领域时,将科学与人类的道德联系起来,这主要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孔多塞把科学看作是社会和谐化和人类精神不断完善的推动力量。一方面,他按照科学发展的模式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他看来,牛顿物理学探求客观世界真实性的模式也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只要将科学的进步力量适用于社会,就能提升社会生活在道德上的合理化程度;另一方面,在孔多塞看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犯罪与冲突,实质上是人们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错误的、不科学的运算,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手段就会不断提高,人类精神最终将实现完美化,他说:“科学的进步保证了教育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技术的进步本身随后又加快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其作用的日新月异的交相影响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跃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11]卢梭则相反,将科学看成是人类在道德上堕落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自然是美好。他对科学始终是拒斥的态度,他批判牛顿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泯灭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机械化、同一化。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失范,社会的腐化堕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传统美德沦丧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义那种虚伪一致的面貌下面,隐藏使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明背后”。^[12]此外,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使人类的生活日益安逸的同时,也使得懒惰奢侈之风盛行,勇敢尚武的德行消失了。由于从道德层面对科学持否定态度,直接导致了卢梭与大力推崇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派的决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5.
- [2] 亚·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上卷.周昌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1 5.
- [3] 杨肃献.英国有启蒙运动吗:历史学家论18世纪的英国与启蒙运动[J].新史学,1998(4).
- [4] W. C. 丹皮尔.科学史(上)[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44 253~254 280
- [5] 托马斯, L. 汉金斯.科学与启蒙运动[M].任定成,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 10 37 23 7
- [6] 伏尔泰.哲学通信[M].高达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25
- [7] 拉·梅特利.人是机器[M].顾寿观,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65

(下转第117页)

合义务的行动’。”赫尔曼指出了亨森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见:“当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时,非道德的动机(incentives)可以是在场的,但是它们不可以是行为者在行动时的动因(motives)。如果行为者的行动是出于义务的动因,他的行动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看作是选择的根据”。^{[5] (20)}不仅如此,赫尔曼还根据康德对行为的分类,强调了“义务所要求的行为”这一限制条件,对一个行为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性。^{[5] (21)}并参考该页的译者注)赫尔曼对于亨森的修正,强调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爱好、幸福等,可以作为动机,但不能作为动因,即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而能成为动因的就只有“义务”或“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并未否定亨森把“义务”的动因当作道德价值的充分条件的观点,而只是从动机与动因的区分中,突出了“义务”与其他因素相比,在决定一个行动的道德性时的决定性意义,它排斥了诸如利益好处、爱好、期待的结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可能性,而只承认“出于义务动因”作为唯一决定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为的根据。

在此,我们还应该再思考一个问题,即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它究竟有无道德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以“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是否可能”为前提。这个问题即是说,一个行为能否同时以义务和爱好为动因。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伴随有爱好,就可以断言该行为既是出于义务又同时出于爱好?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出于……而行动”表达的是促使一个行动产生的规定性根据、决定性的原因。也许,大众的观点能接受“义务”和“爱好”共同为有道德价值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但是,在康德看来,“出于义务而行动”、把义务和善良意志当作行为准则,从而敬重法则,把“所有的质料原则都抛开了”。^{[2] (155, 400)}质言之,在康德看来,义务作为行为的“动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因,但却未排斥诸多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机。甚至可以断言,任何作为动因的实践原则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时容纳其他的原则作为动机。从而,对于康德来说,“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是不可能的,而问这样的行为有无道德价值,

本身就提错了问题。

四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普通道德理性知识中,康德对一个行为如何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探讨,结穴于“出于义务的动因做义务要求的行动”这一点。他虽未明言,却隐含了“出于义务的动因”是一个义务要求的行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唯一充分的原因。当然,出于义务的动因,即意味着是善良意志规定的。从而,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仅仅由善良意志规定的、仅仅出于义务的动因而做出的义务要求的行为,即是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在此,那种把“出于义务”当作是行为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以及“只有完全排除掉爱好,行为才由义务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的观点,都是对于康德的误解。这里的关键在于它们没有抓住康德对动机和动因的区分,把“伴随着爱好”和“爱好作为动因”混淆起来了。明确这些区分、澄清康德在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念问题上的观点,对于恰当理解康德的伦理学、消解其“先天严格主义”的名声,以及康德伦理学的大众化和实际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Schiller Scruples of Conscience trans by Jens Timmermann. See his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07.
- [2] Kant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Groundwork of Metaphysics of Morals [M]. trans by Mary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1996.
- [3] Sally Sedgwick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08.
- [4] 林火旺. 伦理学入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5] 芭芭拉·赫尔曼. 道德判断的实践 [M]. 陈虎平,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华 男 编 发)

(上接第 113 页)

- [8] E 卡西勒. 启蒙哲学 [M]. 顾伟铭, 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5-10.
- [9] E 伯特.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M]. 徐向东, 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 21.
- [10] 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 [M]. 王福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

社, 2001. 5~6-158.

- [11] 孔多塞.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M]. 何兆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98.
- [12]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 [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10.

(伟 华 编 发)